

2000
年
日中
關係發展史

著 季 李

李季著

二千年中日關係發展史

第一冊

學用社發行

有 所 權 版

著 季 李

史 展 發 係 關 日 中 年 千 二

冊 一 第

角 九 幣 國 價 實

社 用 學 者 行 發

路 大 四 州 柳 四 廣

館 書 圖 東 亞 售 經 總

號 九 巷 二 路 西 邇 邕 州 廣

局 書 大 各 省 各 處 售 代

版 出 月 一 十 年 七 十 二 國 民

序言

八一二的大炮一轟，上海一般文化人的飯碗幾乎全被震破了，數年來以譯述爲生的我，自然不是例外。向來的生活打斷了，大時代的巨輪轉動了，我們怎樣參加呢？怎樣去從事『當務之急』呢？『投筆從戎』罷！這是中國書生的一句豪語，並且曾見諸實行，我倘若轉去二十年，的確要這樣幹，我的志向自然不在『立功異域，以取封侯』，而是要拿着槍桿子，跑上前線，痛痛快快地拚個你死我活，一洩胸中的悶氣！但現在已是中年人了，二十年來的著述生活把我的體力弄衰弱了，此時還要『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確打一個人不贏。

槍既不能拿，還是拿筆罷。筆上怎樣表見呢？當開戰初期，有許多人在報上發表一種千篇一律的文章，說日本的根基怎樣淺薄，牠決不能持久，我們如能支持六

個月，牠一定會崩潰！當時的羣衆大都相信這種說法。我依常識判斷，知道決無此事。這種自欺欺人的宣傳雖可取快一時，但終于會使羣衆失望，並發生不信任的心理。此項工作我是不能夠做的。還有許多人在報上對日本人盡譏笑怒罵的能事，甚至於說他們原來都是小鬼，自有我國學生前去渡袖，他們才漸漸高大起來，現在他們來打我們，無異兒子打老子。像這樣藉護罵來洩憤的低級趣味的勾當，更是我所不屑爲的。

這樣看來，我雖是一個筆不停揮的人，然要在這一次大事變中來拿筆，也就有些幹不來。槍與筆兩種最重要的武器，我都無法運用，真有

揮筆揮刀無是處，

昂藏七尺愧平生！

之感。我既遭遇這個偉大時代的偉大事業，自然要積極地參加。但什麼是最有效的方法呢？榜徨復榜徨，八月已過去！

大約是九月初的某一天，一位朋友忽然來找我，說有幾個同鄉擬研究中日問題，出版中英文的小冊子，要我加入。我當時回答道：「好是好的，不過我對於這一道是門外漢，又不懂日文，現在『臨渴掘井』，實在來不及！」但因為參加的人還有兩位是舊相識，既承盛意相邀，也就不好拒絕，遂答應了。八九個人經過幾次集會之後，終於決定組織一個中日問題研究社，推我起草社章，旋經通過，並舉我為編輯主任。我們的團體人數雖少，然就外國文字講，有懂日文的，有懂法文的，有懂德文的，並有精通英文的；就學科講，有研究社會科學的，有研究自然科學的，有研究文學的，有研究美術的，也有研究歷史的。如果分工合作，而又持之以恆，我相信總可以弄出相當的成績來。當時大家都很樂觀，很興奮，馬上開始分頭籌集款項，搜羅書籍，滿擬羣策羣力地努力幹一下，藉盡自己所能盡和所應盡的責任。

可是在這前方而兼後方的上海，生活的鐵鞭打在我們的身上，實在比飛機大炮

轟炸的威脅，直接而有力的多！歷時不久，所謂中日問題研究社的社員幾乎跑光了！我呢，對於生活的壓迫，本來是家常便飯，這裏如有最後的一口飯可吃，決不輕動。一因茫茫禹甸，無處安身，俯仰依人，素所深恥，動也沒有好處；二因我有大批的英德文書寄在南市，（後來都化為灰燼！）有大批的綠裝書放在身邊，牠們都是我二十年來辛苦得來和用慣了的工具，此時既無法運走，而又不能拋棄，否則就會減少我的工作效能，動也實在只有害處。于是決定鼓起我的硬勁來硬擋。生活雖被深深壓在水平線以下，但七挪八扯地過，也還不必鑽入難民收容所，去領略那擁擠不堪而又強迫閒惰的非人生活的滋味，總算是幸運的。因此，我的心中十分滿足，我的精神更加倍振奮。

『一不做，二不休，』是我向來做事的態度。我們的社雖已烟消雲散，僅剩我一個光桿，但光桿也自有光桿的幹法，我不獨未曾因此灰心短氣，反而愈加堅決地決定依賴自己的力量，獨自幹下去。于是一面搜羅關於中日問題的書籍，日夜翻

閱，一面也挨衣烏愛啞地學幾句日文。這樣在飛機大炮合奏的交響曲中，或其餘音嫋嫋，繁迴腦際的時候，極緊張而又極嚴肅地幹了半年多，畢竟弄出一點頭緒；便動手寫起來，現已草就六章，自成一個段落，特先付排，作爲第一冊。

一年來看過的中日問題的書報也不少，心中發生許多感想，今特趁着做序言的機會，寫出一二，就正于國人之前。

中日的摩擦，雖肇端于唐，宋，然要到明，清和民國，才日趨劇烈而頻繁。當明清時，每逢中日多事之秋，輒能刺激一班文人學士，甚至于統兵大員，著作或編纂關於日本，中日，中日鮮等問題的書籍。明代這一類的專著在三十種以上，（有許多有目無書，恐已散失。）而以胡宗憲——本應爲鄭若曾——的籌海圖編十三卷，宋應昌的經略復國要編十四卷，鄭若曾的江南經略八卷爲最著名。到了清季，對於日本很有幾部巨著，如姚文棟的日本國志十卷，日本地理兵要十卷，日本海圖一百五十餘幀，舟路圖說五十餘幀，傅雲龍的游歷日本圖經三十卷，黃遵憲的日本

國志四十卷，王先謙的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陳家麟的東槎聞見錄四卷是。其他如遊記，瑣識，短篇，或詩詞等，更不勝枚舉。

民國成立以來，中日的衝突雖層出不窮，但關於日本或中日問題的著作，真是少得可憐！直至九一八的前夕，才陸續出了一些書，不過比較值得提及的，也只有寥寥三數種。九一八和一二八以後，智識分子被飛機大炮驚醒了，情形便大不相同，研究日本或中日問題的報章論文，專門雜誌，小冊子，叢書，以及大部頭的著作，真如雨後春筍，蓬蓬勃勃地產生出來了。如日本研究會小冊叢書至民國二十五年三月止已出至八十五種，王芸生輯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至民國二十三年五月止已出至第七卷，足以代表數量之多！

可是把我們對日本或中日問題的研究，和日本人對中國或中日問題的研究比較一下，無論何時，國人總不免有『小巫見大巫，神氣彈矣』之嘆！當四十二年前，黃遵憲很感慨地說：

「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國之事，纖悉皆知，而宋人視我國事，如隔九重雲霧。』」以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已足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鄒衍之談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誕不足論議也者，可不謂狹隘歟？」（見黃氏日本國志（敘二頁））

然這還可以前清末葉，閉關自守的積習未除，國內青年對於日籍很少接觸的機會爲解。即黃遵憲所謂「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歷世紀載又不詳其事，安所憑藉以爲考證之資？」（見同書同頁）及十年前，戴季陶估計我國留日學生至少有十萬人的時候，情形並不見得好些，所以他更十分沉痛地說：

『你們試跑到日本書坊店裏去看，日本所做關於中國的書籍有多少？哲學，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社會，地理，歷史，各種方面，分門別類的，』

有幾千種。每一個月雜誌上所登載講「中國問題」的文章有幾百篇。參謀部，陸軍省，海軍軍令部，陸軍省，農商務省，外務省，各團體，各公司派來中國，長住調查，或是旅行視察的人員，每年有幾千個。單是每年出版的叢書，每冊在五百頁以上，每部在十冊以上的，總有好幾種，一千頁以上的大著，也有百餘卷。「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裏化驗了幾千百次。我們中國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幾乎連日本字都不願意看，日本話都不願意聽，日本人都願意意見，這真叫做「思想上閉關自守」，「智識上的義和團」了。」（見戴季陶日本論二至三頁，民國十七年民智書局出版）

就是當三年前，我國留日學生的數目又已增加，而國人研究日本或中日問題正在極盛的時代，學者們仍舊非常悲觀，例如馮象昇說：

「總之，日人對於我國東北的研究，不論古今，不論那一科，無不有突飛

猛進的成績。返看我國，事事落後，又事事顛頂，真不禁令人長嘆息！按中日戰前有「朝鮮學」，朝鮮以滅；日俄戰前有「滿鮮學」，遼省以陷；「九一八」以前有「滿蒙學」，四省以亡。今之日人又高唱所謂「東亞學」了，嗚呼！劍及履及，事至迫矣，請看明日之東亞，將爲誰家之天下？願我國人醒一醒吧！」（見禹貢五卷六期馮家昇日人對於我東北的研究近狀六頁）

我們的文化人，特別是我們的十幾萬留日學生不大爭氣，對於日本或中日問題研究得太少，對祖國不能作有力的貢獻，這當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許多年來，一般文化人多痛罵軍人槍口對內，自相殘殺，沒有作對外作戰的準備，這固然是對的；但如反躬自問，自己在文化方面又有什麼準備？像日本紀州名醫新宮涼庭所謂「筆鋒抉破姦凶膽，勝聲驕胡百萬兵！」（見大日本史講座第十七卷中山久四郎支那史籍上的日本史二〇〇頁，昭和十一年再版）

的著作，我們的著作界恐怕連影子也沒有！文武兩方對比起來，不還是半斤與八兩

麼？

不過這個問題也是相當複雜的，現在專門來罵拿筆桿的人，不獨沒有用處，並且也不大公平。因為卽就清末姚、傅、黃、王，諸人的著作講，雖不見得怎樣精密，然多是花費十幾年或幾年的工夫著成的，都有一讀的價值；可是無論中日問題鬧得多麼兇險，讀書界不讀這些書，圖書館也大都未曾收藏這些書。姚文棟的著作係光緒年間出版，時間並不長久，但我跑過上海許多圖書館，都沒有找到，再徧尋舊書店，仍舊撲個空，最後託友人去找他的令孫——卽地理學家姚明輝——他的也因兵亂遺失了。本地人在本地刊佈的書，於短短的期間內消滅淨盡，這是讀者不需要的明證。普通讀者不用說，連「十幾年來，總抱着一個希望，想要把『日本』這一個題目，從歷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學，文學，宗教，政治，風俗，以及構成這種種東西的動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評判的能力，在中國人的面前，清清楚楚地解剖開來，再一絲不亂的裝置起來，」（見日本論一至二頁）並於民國六年在民國日報

上登過一篇連載四十天的批評日本的文章，又於十七年刊佈日本論的戴季陶也自承「除了三十年前黃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國誌而外，我沒有看見有甚麼專論日本的書籍。」（見同書一頁）

其實也不過沒有看見姚，傅，王，陳四氏的著作，即黃公度的也未曾會過面，故把日本國志寫作日本國誌。連做日本論的人都不肯去找這一類的書讀一讀，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他們辛辛苦苦著了書，沒有人肯去讀，硬要他們學太史公一樣，「藏之名山，傳與其人，」也難乎其爲著作家了！

可是現在大時代已經到了，中日已經達到總結賬的時期了。我們的總賬如果還不開出來，所謂文化人實在是太不負責任，無論有何種口實，都不能解脫自己的罪戾！我是在這種意旨上，不顧自己才力的薄弱，與生活的困苦，也不管一切工具的不完備，與材料的缺乏，毅然決然來擔負這種人所不願意幹的重任。我在軍事上雖已不能做一個前哨的小兵，但在思想上和學術上始終願作一個披荊斬棘的小卒。雖

則披荆斬棘是困難的工作，而小卒更不會有多大的成就，但沒有整千整萬的小卒執行初步的工作，永遠造不成一個大將的勝利與成功。況且牠既可以引玉，我們爲什麼不盡自己的力量幹一下呢？

還有一層，我們如果知道日本人對於中國或中日問題的研究達到什麼程度，自己更應該起來幹，並且不能不幹。請聽我盡情一說。

我們在上面徵引黃，戴，馮三人的話一致推崇日人，貶責國人，這在鞭策國人自勵，警惕國人自強一點上，原是應該的，沒有可非難的地方。但國人如果老是一廂相傳的籠統的贊揚和貶責，而沒有進一步的精密分析與批評，獨立研究與創造，那不過是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結果，在一方面會發生盲目崇拜他人的言行，在另一方面會呈出自戾以至自暴自棄的心理。倘若真正達到這種地步，便是在思想上和學術上向他人『屈膝』！

關於『屈膝』的問題，日本現在談得很起勁，牠已明白宣佈要中國『屈膝』，

所以我趁此機會，對這個問題要發揮幾句。大家應當注意：膝這個東西是一種大怪物；牠如果不肯屈，那無論遇着怎樣大的困難，始終不會屈，古人且不顧『爲五斗米折腰』，（見晉書九四卷陶潛傳一六頁）更談不到『屈膝』；但牠如果肯屈，那無論在什麼場所，便會視爲唯一無二的救命法寶，我們的習語中所謂『婢膝』，就是一個顯例。當南宋時，高宗將向金人『屈膝』，胡銓痛哭流涕地上疏抗爭道：

『此膝一屈，不可復伸！』（見宋史三七四卷胡銓傳二頁）

這確是一種殘酷的真理！全中國人應當記取的。我們的祖先早經指出『玉碎』、『瓦全』的兩條路，就是屈膝與不屈膝的另一種說明。大家不要把自己的膝頭看做蝦子，以爲能屈能伸，可以自由運用，指揮如意的。其實，依我的觀察，因爲先天與後天的培養不同，自然與社會的環境各別，膝頭遂分兩種：一種是硬如鐵，一種是軟如綿的；軟如綿的固然沒有法子使牠硬如鐵，但硬如鐵的一屈之後，便會變成軟如綿。（所謂『百鍊鋼化成繞指柔。』）所以胡銓有『此膝一屈，不可復伸』的痛

語。我現在也可以把前人兩句膾炙人口的話改掉兩個字，警告國人道：

一屈膝成千古恨，

再回頭已百年身！

至於日人要中國『屈膝』，我們是不是會遵命，演成史記上所謂『曲膝請和』（按曲同屈）的結局？這要看我們受過無數慘酷的教訓後，有沒有把自己的膝頭鍛鍊得更堅硬，能不能始終使牠挺直，做個頂天立地的硬漢，甯為玉碎，毋為瓦全？將來的事實自可證明，不必多說。不過就思想上和學術上看，有少數所謂領袖人物確有屈膝的傾向，而在日本通中尤為顯著，如研究日本文學三十年的人會向大家保證，世間沒有文化侵略這回事，儘可相信他人的文化，（詳情見後）而日本話比日本人說得還好的人竟以『恐日病』著名，這不是在思想和學術上向他人『屈膝』是什麼？！

這種傾向在現今的情勢之下，自然不發生多大的影響，不過牠一有更順利的機